

理论联系实际是繁荣 社会科学的根本方针

黄训腾

《中共中央关于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指导方针的决议》指出：“新时期我国马克思主义理论工作的任务，就是要从经济、政治、文化、社会各方面，研究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和全面改革的新情况，新经验，新问题，探索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规律，同时要研究当代世界的新变化，研究当代各种思潮，批判地吸取和概括各门科学发展的最新成果。”^①十分清楚，摆在我们社会科学工作者面前的任务是极其艰巨而又光荣的。实践证明，只有坚持从实际出发、理论联系实际的原则，才能发展马克思主义，繁荣党的社会科学事业。理论联系实际，是繁荣和发展社会科学的根本方针，也是马克思主义倡导的优良学风。

—

坚持理论联系实际，这是马克思主义理论工作者的根本任务，也是我们党的理论工作的优良传统。马克思说过：“理论在一个国家的实现程度，决定于理论满足这个国家的需要的程度。”^②理论的命运从来都是看其满足时代需要、社会实践需要的程度而定。还是马克思说的好：“正确的理论必须结合具体情况并根据现存条件加以发挥。”^③从理论工作的本性来看，它是不能脱离现实生活的，它必须重视现实问题的研究。我们党也从来是这样来指导、要求理论工作的。在民主革命时期，我们党和毛泽东同志曾经反复强调，理论工作必须着重研究中国革命的实际问题，反对用教条主义的态度对待马克思主义，反对理论脱离实际的倾向。早在1920年3月，毛泽东同志在给友人的一封信里就曾经发挥了这样的思想：作为中国人，对于“中国”这个地盘内的情形，不可不加以实地的调查及研究。在他找到和接受了马克思主义以后，更是致力于用马克思主义理论作指导来从事这种实地的调查和研究。他的战斗的马克思主义著作《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就是在对中国的社会阶级和农民运动的情况进行深入调查研究的结果。尔后，毛泽东同志在《反对本本主义》、《‘农村调查’的序言和跋》等文章中进一步坚持理论联系实际的原则，重申“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的真理；在《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等文章中特别批评了“圣经上载了的才是对的”这种把“本本”当“圣经”的教条主义倾向。在延安整风时期，毛泽东同志更加明确地指出：“……要有目的地去研究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要使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和中国革命的实际运动结合起来，是为着解决中国革命的理论问题和策略问题而去从它找立场、找观点、找方法的。这种态度就是有的放矢的态度。‘的’就是中国革命，‘矢’就是马克思列宁主义。我们中国共产党人所以要找这根‘矢’，就是为了要射中国革命和东方革命这个‘的’”

的。”④这种有的放矢的态度，就是实事求是的态度，理论联系实际的根本方针。正是在延安整风时期，在毛泽东同志提出的这种理论联系实际的根本方针指导下，党的社会科学事业得到了空前的大繁荣，中国革命的面貌也从此为之一新。当时，毛泽东同志不仅写出了《实践论》、《矛盾论》等光辉马克思主义著作，还写出了《论持久战》、《新民主主义论》等一系列指导中国革命的纲领文献。中央其他领导同志如刘少奇、周恩来、朱德等和其他马克思主义理论工作者也在坚持理论联系实际、繁荣社会科学、推动中国革命胜利发展方面作出了自己杰出的贡献。而所有这一切，又为我们党领导全国人民推翻三座大山，建立新中国的伟大胜利奠定了坚实的思想基础。完全可以说，如果没有延安时期坚持理论联系实际而带来的社会科学事业的空前大繁荣，那么，中国革命的胜利是不可想象的。完全可以说，中国革命的胜利，不仅是中国人民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英勇奋斗、流血牺牲的结果，也是马克思主义的理论联系实际的优良传统在中国的胜利。但是，这个优良传统，在“十年文化大革命”期间遭到了林彪、江青两个反革命集团的肆意践踏和破坏。直到粉碎“四人帮”以后，特别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通过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讨论和对“两个凡是”的批评，才逐步扭转了这个倾向。我们党强调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理论联系实际，强调理论工作要着重研究四化建设实践中提出的重大课题，要探索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过程中各个方面的发展规律，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服务，这无疑是党的理论工作的优良传统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的继承和发展。邓小平同志多次指出：深入研究中国实现四化所遇到的新情况，新问题，并且作出有重大指导意义的探索，这将是我们的思想理论工作者对马克思主义的重大贡献，对毛泽东思想的真正高举。今天，我们国家正面临着一个伟大的历史任务，那就是要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把我国建设成为高度文明、高度民主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的发展，需要社会科学的大繁荣，需要社会科学提供更多更好的科研成果，而要社会科学的大繁荣，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服务，就必须继续坚持理论联系实际这一根本方针，坚持用马克思主义这根“矢”来射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这个“的”，如果我们全党全国人民都这样作了，那么我们的目的就一定能够达到。

二

理论工作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服务，加强对现实问题的研究，也是理论本身繁荣和发展的根本途径。理论来源于社会实践，又是由社会实践赋予活力，在社会实践的基础上得到丰富、完善和发展的。邓小平同志在讲到科学和教育工作的時候也说过：“一个新的科学理论的提出，都是总结、概括实践经验的结果。”⑤离开社会实践，从书本到书本，从概念到概念，理论的发展就成为“无源之水”，就要陷入枯萎和停滞的困境，而转向社会实践的研究，理论的发展就会获得蓬勃的生命力。这是马克思主义科学理论的全部发展历史证明了的。列宁提出的“社会主义首先在一个或几个国家中获得胜利”的理论就是一个最好的证明。在马克思、恩格斯在世时资本主义还处在自由竞争阶段，根据当时资本主义社会中的经济、政治条件，他们认为社会主义革命不可能单独在某个国家发生而只能在一切文明国家，至少在欧洲几个主要国家内同时发生。到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自由资本主义发展到了垄断资本主义阶段，资本主义世界的经济、政治状况发生了很大的变化。首先资本主义的发展在各个国家是极不平衡的。由于经济发展不平衡规律的作用，使得某些后起的资本主义国家在经济政治实力上超过了老牌资本主义国家，出现了“跳跃式”的发展；第二，在进入帝国主义时代后，世界殖

民地早已被老牌殖民主义者瓜分完毕，这样新老帝国主义在占有殖民地的斗争中必然存在尖锐的矛盾，而这种矛盾运用一般性的经济、政治手段根本不能解决，最后只有诉诸武力，通过战争来重新瓜分殖民地；第三，战争又必然耗费大量的人力财力物力，造成新的矛盾，引起新的社会危机，从而造成世界帝国主义体系中的薄弱环节；第四、如果这个薄弱环节上的那个国家的无产阶级和人民群众已经觉悟过来，有了成熟的革命的政党，并且能根据实际情况制定正确的路线和政策，适时地领导人民群众起来进行革命，那么，无产阶级就完全有可能首先在这个薄弱环节的国家中夺取社会主义的胜利。正是列宁坚持理论联系实际，从变化了的资本主义世界的实际和俄国的实际情况出发，而不囿于马克思、恩格斯原有的结论，创造性地提出了“社会主义首先在一个或几个国家中获得胜利”的理论。历史的发展证明列宁这一理论是完全正确的。同样的，毛泽东同志在领导中国革命的过程中，坚持从中国的实际出发而不囿于列宁的十月革命城市武装起义的现成结论，提出了农村包围城市的革命武装割据，最后夺取城市的革命理论，历史的发展同样证明了毛泽东同志的这一理论是完全正确的。

从我国社会主义建设来看，也只有面向实际，理论才能获得蓬勃的生命力，才能不断丰富和发展。关于社会主义商品经济的提出就是一个生动的证明。在马克思主义的创始人那里，未来社会（准确地说是共产主义）是作为商品经济对立物被提出来的。恩格斯在《反杜林论》中就已经指出：“一旦社会占有了生产资料，商品生产就将被消除，而产品对生产者的统治也将随之消除。”^⑥列宁虽然在谈到社会主义过渡时期还要保留商品经济的问题，但是，对当时实行的新经济政策和开展的商品贸易，仍然被看作是一种暂时的退却，是过渡时期衰亡着的资本主义残余，“是还保存着的、以及在小商品生产基础上复活着的资本主义”的基础。斯大林虽然在《苏联社会主义经济》一书中，批判了那种认为社会主义要消灭和取消商品生产的观点，但是，他还是要限制商品生产和价值规律的范围。他们的这些思想对毛泽东同志晚年对商品经济的看法影响甚大，以至发展到彻底否定商品经济，认为社会主义商品生产与资本主义“差不多”。过去我国领导经济工作上曾多次发生过‘左’的倾向，矛头都是指向商品经济，其根源就在于此，就在于错把社会主义商品经济等同于资本主义。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党中央以马克思主义理论为指导，从当代中国社会主义建设实际出发，总结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经验教训，明确地提出了社会主义经济是有计划的商品经济，发展商品经济是社会主义不可逾越的阶段，这是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重大突破和发展。它不仅打开了中国经济体制改革局面，而且为促进我国的政治体制改革打下了基础。

关于对外开放也是如此。党的十二届六中全会的《决议》指出：“对外开放作为一项不可动摇的基本国策，不仅适用于物质文明建设，而且适用于精神文明建设”，“必须下大决心用大力气，把当代世界各国包括资本主义发达国家的先进的科学技术、具有普遍适用性的经济行政管理经验和其他有益文化学到手，并在实践中加以检验和发展。”^⑦十分清楚，这种引进和学习是有条件的，是必须服从于服务于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实际需要的。首先，要采取分析的态度，对于外国的先进的科学技术、管理经验和文化理论当然要吸收，要拿过来，但这种“吸收”和“拿来”决不是毫无选择、毫无批判地兼收并蓄，赶时髦，而要经过分析研究，实行取其精华，去其糟粕，有批判地加以吸收，决不能“食而不化”，更不能“全盘西化”，“全盘西化”就是全盘否定社会主义；第二，引进和学习的即使是正确的东西，也要从中国的具体国情出发，从中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实际出发，也不能生吞活剥，搞教条主义，否则，也会造成损失，招致失败的。应该说，马克思主义的原理是放诸四海而皆准的普遍真理，是完全正确的，但是如果不从中国革命实际出发，不把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与中国社会主义

现代化建设的具体实践结合起来,社会主义现代化也是很难建成的。实践证明,即使是正确的真理,也不是凝固的、僵化的,而是在实践中不断发展、丰富和变化的。只有从实际出发,以实践作为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敢于突破那些已被实践证明是不再正确的或不适合变化了的情况的判断和结论,马克思主义才能随着生活前进并指导生活前进。

历史和现实的经验反复证明,理论联系实际,从实际出发,这是无产阶级革命胜利的保证,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成功的保证,也是马克思主义理论本身繁荣和发展的根本途径。所以,党中央一再要求理论工作者真正深入实际,对现实中提出的新问题作出马克思主义的回答,从而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

我们强调对现实问题的研究,并不意味着对基础理论研究的放松和轻视。理论工作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服务,道路是宽阔的,领域是广大的,内容也是丰富的、多方面的。这里既包括对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过程中各个方面发展规律的研究和探索,也包括从理论上回答广大干部、群众、青年从自己的学习、生活和工作实践中提出的种种思想认识问题,向广大群众进行马克思主义科学理论的大普及,用马克思主义思想教育人民,用共同理想武装人民的头脑,提高他们的政治觉悟,认识能力和思想理论水平,也包括对哲学、社会科学的基础理论的研究,等等。正如邓小平同志曾经说过的,强调深入研究新情况,新问题,“这决不是说,凡是同实现四个现代化没有直接关系的思想理论问题就可以不去认真深入地研究。哲学、社会科学同自然科学一样,决不能忽视基础理论的研究,这些研究是理论工作的任何巨大前进所不可缺少的。”^⑧

三

坚持理论联系实际的方针,改变理论脱离和落后于改革和建设的实践的状况,任务是十分艰巨的。

首先,坚持理论联系实际,必须克服教条主义的影响。1843年9月,年仅25岁的马克思在给青年朋友卢格的信中写道:“我不主张我们竖起任何教条主义的旗帜”,“新思潮的优点就恰恰在于我们不想教条式的预料未来,而只是希望在批判旧世界中发现新世界。”^⑩十分清楚,只有在实践中发展和创立建设新社会的理论,而不是教条式地从书本中、从头脑中寻找解决社会问题的逻辑公式和万灵圣药,才是正确地探求新社会的方向。

马克思主义的创始人从不把自己创立的理论凝固化,他们总是不断研究新情况,一旦发现自己过去的观点有缺陷,就毫不犹豫地用新的看法修改自己过时的看法,使自己建立起来的理论不断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的创始人也从不把自己的理论看成是“终极真理”,堵塞后人发展他们创立的科学理论的道路。他们反复强调,不应把他们的理论看成僵死的教条,而应当在实践中不断把它们推向前进。可我们有些同志往往习惯于动不动就要到马克思主义著作中去找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药方”,而每次都找不完整。实践证明,马克思主义并不是包医百病的灵丹妙药,在马克思主义著作中是不可能找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现成答案的。比如说,我们就不可能从中找到社会主义商品经济的现成答案,正如列宁不可能从马克思著作中找到“社会主义首先在一个或几个国家中获得胜利”的现成答案一样。同样,那种认为从书本中找不到现成答案就认为马克思主义“过时”了,“失灵了”,转而盲目崇拜某些资产阶级的哲学和社会学说的认识也是错误的。这两种情况表面上似乎是对立的,其实在对待马克思主义的态度上、方法上则极其相似,都是把马克思主义当作僵死的教条,不同的是前者

拿看书本结论作为现成答案去硬套,后者则因为没有找到现成答案而对马克思主义产生怀疑,二者都是用教条主义态度对待马克思主义。为了贯彻理论联系实际的方针,坚持发展马克思主义,繁荣社会科学,我们必须坚决克服教条主义的影响,真正作到从马克思主义著作中找立场、观点、方法,而不是找现成答案。

第二,坚持理论联系实际,还必克服那种轻视实践、脱离实际的倾向和怕犯错误而同现实保持距离的消极现象。当前,我国社会实践中最重要的任务,就是要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实行全面改革和对外开放,走出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来。我们理论工作者怎么可以对此不闻不问,甚至轻视或者采取保持距离的错误态度呢?!我们的经济学、政治学、社会学等等学科如果不能针对当前发展变化着的经济现象、政治现象、社会现象以及人们的思想状况,解决实践向社会科学提出的许多必须解决的问题,研究工作就会成为空对空。只有使理论和实际密切结合起来,实际工作才方向明确,研究工作也才生气勃勃。因此,有必要反复强调理论一定要面向实际,面向四化的实际,而且不只是一时一事地面向实际,而是必须长期地、不断下苦功去面向实际。当然,还必须继续肃清“左”的思想影响,坚决贯彻“双百”方针,真正创造一个安定团结的环境和民主和谐的气氛。学术问题和艺术问题要遵守宪法规定的原则,实行学术自由、创作自由,讨论自由、批评和反批评的自由,只要不违反宪法和四项基本原则,就可以在平等的基础上展开自由的讨论。这样做的目的,正是为了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繁荣社会科学事业。

第三,关键地是要真正改变理论落后于改革和建设的实践的状况。真正在实践中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理论,不是一蹴而就的事,困难很大。这里除了理论探索本身的困难这个问题之外,还有两个方面的问题。一是我们的经济体制改革还刚刚开始,我们的政治体制改革还处于调查研究阶段,完整的经济体制的形成以及政治体制改革的方案的制定还有待时间,原有的经济发展战略正在向新的经济发展战略过渡,新的经济发展战略还没有完全形成;二是一些被实践证明不正确的或已经过时的社会主义经济理论仍然或多或少地束缚着人们的头脑,人们往往习惯于把新的实践纳入这些已经过时的理论框架之中,这样会给理论工作者的大胆探索和开拓创新精神形成有形无形地束缚和压抑。但是,尽管如此,我们仍然没有任何理由不坚持理论联系实际的方针,努力改变理论落后于改革和建设的实践的状况。列宁说的好:“理论要变为实践,理论要由实践来鼓舞,由实践来修正,由实践来检验。”^⑩如果理论不理睬实践,那么实践也就会不理睬理论,这种理论必然是空洞的,毫无意义的!

注释:

①⑦ 《中共中央关于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指导方针的决议》。

②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第462页。

③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7卷第433页。

④ 《毛泽东著作选读》下册第477—478页。

⑤⑥ 《邓小平文选》第55页,第166页。

⑧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卷第 页。

⑨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第416页

⑩ 《列宁全集》第26卷第386—387页。